

# 跨时空对话

文/阎晶明

歌舞伎、花伞、武士、佩剑、樱花树、光影下的日式门窗，穿和服、留胡子的老者盘坐写作。以话剧之名出演的《大鼻子情圣》充满了日本元素。这是同来自欧洲的原著甚至同剧情介绍不能完全对位的视觉感受。一部欧洲小说，曾经改编成电影，现在，由一位日本导演来编导，它居然被东方化了，涂沫上浓厚的日本色彩。

然而它又是拼贴的，在全日本的舞台视觉中，奏响的是意大利歌剧《茶花女》曲段，日语台词、中文字幕中，夹杂着西洋人名和地名。故事的框架还是原著的，看得出故事主线和情节主调，故事核和爱情表达都能感受到原著的指向。然而，它们被程式化的日式步态、凝固化的日式表情给抽空了，“大鼻子情圣”的喜感消失了，加进了因爱不得而“求死”的日本审美嗜好。

这是一种别扭还是一种刺激？这是一种创新还是一种歪曲？这是导演铃木忠志带来的思考。

无疑，东西方的，具体讲日欧的文化元素，在此剧中并没有达到融合的境地，或者，导演自己也并不追求这个，它就是一种拼贴，它们本来就是符号化的存在，是表面化的，并试图通过表面化的符号达到导演期望的效果。

然而，我又很感佩铃木导演的

改变。东方人如何向出现于欧美的艺术经典致敬？如何演绎这些异域故事？我最怕看到的，是东方人戴一个假发套、穿显然不贴身的西洋服饰，念半文不白的欧式台词。这种看似“忠实”于原著的表演，不可能出彩，算不得艺术创作，很大程度上只是故事的简单演绎而已。铃木忠志在演出后与观众的互动对话中，直率表达了拒绝让东方人完全照搬表演西方形象的做法，此说深得我心，就像我们不可能真正接受“大鼻子”西方人学唱京剧一样。铃木为西方爱情故事“编造”了一个日本故事外壳，在原著与自主创作之间，他不惜“硬伤”式地使其日本化，同时他又是一个国际化的、有世界眼光的艺术家，努力达成东西方杂糅。体现的是人类情感的共通性、不同民族感情选择及其走向的不同。

三天后，又在同一剧场（长安大戏院）观看铃木的另一剧《李尔王》。这是莎翁的经典，具有更加深入人心的影响力。因此观看此剧，更想知道铃木导演会如何处理。这一次有更极端处。场景不乏日本元素，台词是中、日、韩三国语言互不沟通的“对话”。最重要的，莎翁原著周密严谨、耳熟能详，铃木如何能去“创造”？他为《李尔王》加了一个日本本土的

“封套”：一位日本老人遭子女冷落、抛弃，在轮椅上孤独苟且，护士为其朗读莎士比亚的剧本《李尔王》。渐渐的，老人把自己的感情融合到了李尔王身上，相隔万里与千年、一为帝王一为平民的两个老年男人，因同一种遭遇和命运而逐渐重合。这不但使剧情“本土化”，而且连带出“当代性”。跨时空对话，心灵间呼唤，《李尔王》原著的故事成为某种梦境，成为一种间接呈现，导演的介入程度由此大大增加，他没有解构经典，却使简单移植变成了又一次个性化创作。

对原著进行删减、变形的“当代话剧”《大鼻子情圣》《李尔王》，都有空洞、拼贴之嫌；有错位感和衔接上未完全实现突破的感觉。但我们看到的是创造的冲动、探索的自觉、创新精神的投入。有漏洞，也存在很多大的小的可质疑处，但观赏过程中，观众可以强烈感受到导演的美学抱负，对剧情的开始、过程和收束充满好奇和期待。■

# 率真到底

文/郑慧

七尺场。这是一个如此熟悉的称呼，熟悉到似乎从来都没有从耳边，从眼前，从嘴巴里——消失过。

估计以前那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住户里头，大多和我一样，迟迟不知道也许离自家窗台下几十米开外的地方，那个扉门紧闭的宅院，其实是有名字的，刻在它门口的界石上，叫做钱绳武堂。而它的庭院与屋檐之下，一个孩子在这里长到了十岁多，之后远远地离开。

他让七尺场这个不生不僻的地名成为学术典籍的索引条目，从这里开始，可以寻找到一条明晰的路径，延伸至一个始终特立独行的名字。

钱锺书。

对于钱锺书的“锺”字，到底是不是可以简化成为“钟”，文献书籍中似乎未能一致。不过“锺”有“集聚”的意思，引申出“专注”之义。钱锺书抓周一手抓住的是一本书，父亲认为这是天意，于是取名“锺书”。“锺”字简化后与古代打击乐器“钟”意义混淆，且依其生前意愿，也应写作“钱锺书”。

1910年出生于无锡七尺场的钱锺书，因其伯父无子，被过继给了伯父。四岁时，伯父教他认字。六岁时送入秦氏小学，不到半年，因为一场病，伯父让他待在家里不再上学，后来索性自己教他读书。不过伯父的教法不免有些放任的意思，比如说伯父自己早晨出去喝茶，给一个铜板让钱锺书去买酥饼吃，给两个铜板让他去

看小人书。十岁时钱锺书入东林小学，不久伯父去世，父亲接手之后的管教显然严厉得多，比如说为钱锺书改字“默存”，就是要他少说话的意思。

或许因为跟着伯父的那段“耽误功课”的时光，不经意间播下了钱锺书一生率真的种子。

据其堂弟回忆，钱锺书少年时就“狂”得惊人，从小就不愿多说话，倒是对别人的话，倒是批评、挖苦、调侃过不少人，说话既刻薄，又俏皮，这脾气一直未改。这些被他批评的人中有的还是他的同学友人，有的还是他的师长前辈，比如朱自清、周作人、冯友兰、吴宓，甚至还包括他的父亲钱基博。

1929年，钱锺书考入清华，立即名震校园，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，英文却得了满分。他到清华后“横扫清华图书馆”，中文造诣不说，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。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，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，或者画画练书法，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，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。

1933年，钱锺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，清华挽留他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，可他一口拒绝：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！

钱锺书可以“狂”到这种程度，且没有人因此而怪之，固然凭借一时罕见的开明风气，也因其一介书生的自由与洞见使然。

一些人士回忆，他们每次进入线装书库，几乎都会见到钱锺书。

文学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线装书十分丰富，许多线装书的借阅卡上只有钱锺书一个人的名字。

晚年的钱锺书几乎足不出户，但是世界思想的动态对他来说并不陌生。伦敦的《泰晤士报》每周的文学增刊，他是每期必看的，而且看得仔细，所以一些新观点、新学说都逃不出他的视线。

对于世间的追捧或者褒贬，钱锺书看得十分通透，他极力反对所谓“钱学”研究，认为大抵学问是荒荒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，“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”。

就算是被钱锺书定为“太笨”的清华教授吴宓，仍然认真地读了一段实话：

“自古人才难得，出类拔萃，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。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，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，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，他们都是人中之龙，其余如你我，不过尔尔。”

这段话，刻在七尺场钱锺书故居的墙壁展板上。历史的光影中，那个百年前降临的生命，让我们至今还在揣度和感喟。

率真到底，在迟暮的时刻依然还有自己，纵然是时光易老，命运无情。这是最紧要的事情，也是对之最确切的解读。■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徐则臣著  
耶路撒冷

# 走向世界的另类之旅

文/师力斌

《耶路撒冷》是迄今为止徐则臣体量最大的写作，既有“皮糙肉厚”的集大成意味，也有十足的先锋实验范儿；既不乏灵动广阔的现实抚摸，也闪烁着高蹈飘逸的精神烛照，而后者显然是区别于绝大多数写作的重要品相，即使放在当代最优秀的大家头中间也颇为抢眼。

“到世界去”是书的点睛之语。所谓到“耶路撒冷”去，其实就是到精神信仰层面去，“耶路撒冷”具有高度的文化象征性。

当下中国走向世界有多样方式。莫言获奖，姚明扣篮，刘翔跑步，朗朗弹琴，持续地填充着人们走向世界的想象空白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的发展方式不断遭到质疑。当中国频繁地遭遇世界，也会不断遭遇如下提问：除了钱，中国还能贡献什么？《耶路撒冷》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面世的。在物质中国不断走向世界的过程中，精神中国该走向何处？何处安放我们的心灵？中国是否能够在信仰的层面上与西方对话？这是徐则臣用六年时间思考的问题。

在小说中，围绕景天赐的自杀，几个同龄孩子展开了漫长的心灵自剖和精神追问。虽然他们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杀人者，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与这起自杀事件的关联，特别是心灵上的关联。老板杨杰认为，天赐自杀的那把手术刀是他送的。福小是天赐的亲姐姐。在天赐割开手腕的时候，福小犹豫了一会儿。之后她一个人到各地流浪。直到19年后，收养了一个弃儿天送，他们都认为天送就是天赐的转世。社会学博士初平阳也看到了天赐的割腕，但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喊出来，丧失了一次救人机会，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。“没有及时阻止正在消失的生命，算不算凶手？很多年里你都在想这个问题。”徐则臣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当下社会的短板，特别突兀，因而也特别重要。全社会对草根小人物的生存状况熟视无睹，哪怕他们跳楼、喝药、寻短见，连个名字都留不下，更遑论什么社会关心。《耶路撒冷》正

是围绕一个草根小人物自杀这种“本不起眼”的事件，结构了不同人物的命运和精神历程。《耶路撒冷》建造了一种形散神聚的星云结构，各个层面的旋转集结皆指向一个方向，这就是草根小人物的精神和信仰问题。小人物身上有大问题。用小说中典型的说法是，我不收藏瓷器，我收藏人的脸。脸成为关注精神的隐喻。小说的潜台词是，中国要真正走向世界，应当从精神信仰层面展开与西方的对话，而不是仅仅拿着钱到全世界晃荡。

《耶路撒冷》在轻松戏谑的表面之下掩藏着悲壮的努力，在形而下的澡盆中泡着一个形而上的婴儿。它试图在贫富分化、共识破裂的时代找到共识。精神信仰正是这样的“共识”。草根小人物的精神困惑正是中国现实困惑的曲折表达。正是因为贫富分化的加剧，才导致信仰的缺失。近年来不断有小说触及中国人的信仰问题。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借杨摩西之口，说出了一位中国农民对精神归宿的强烈而朴素的追寻，他一生都在追问那个西方传教士带给他的问题：我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。在当下的生活当中，信教成了时尚并非真相，真相是社会问题以一种时尚的方式表现出来，这正是精神危机的暧昧之处。《耶路撒冷》是从死亡来思考信仰。他人的死我们有无责任？这样一个形而上的问题，虽然有些超前，但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当下国人是当头棒喝。建构一种普遍缺乏的灵魂追问、忏悔自觉，成为小说最重要的动力。■